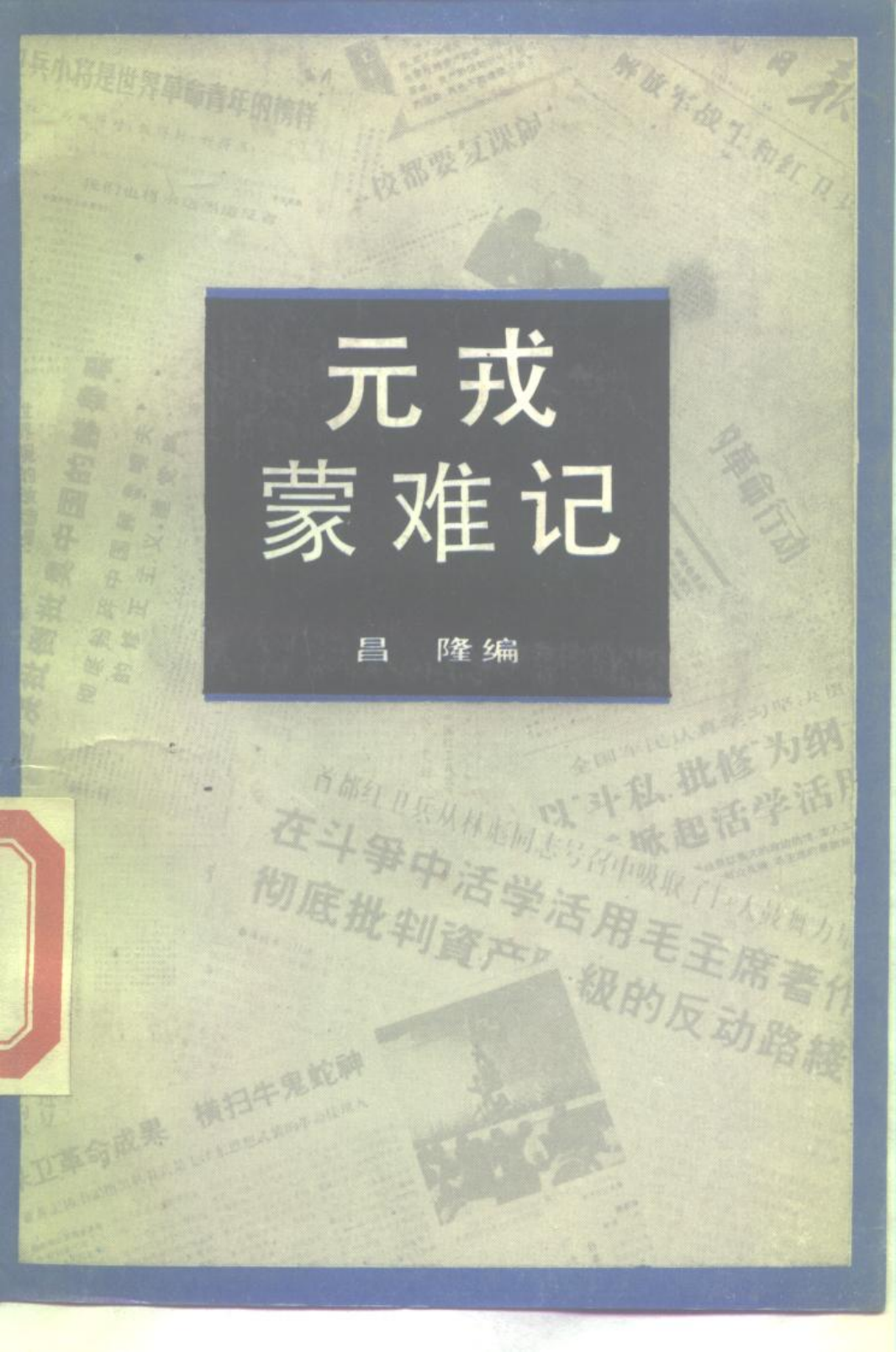


戎元 蒙难记

昌 隆 编



元戎蒙难记

昌隆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元戎蒙难记

昌隆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0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700册

ISBN 7-5059-1212-7/1·868 定价：4.30元

目 录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.....	徐向前	1
一 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.....		1
二 所谓反击“二月逆流”.....		16
三 接受“再教育”和“疏散”到开封.....		25
关于林彪在“文革”中的几个问题.....	聂荣臻	30
一 战争年代林彪的问题.....		31
二 所谓“杨余傅事件”.....		34
三 所谓“二月逆流”.....		39
四 所谓“第一个号令”.....		46
罹难纪实.....	肖劲光	53
一 李作鹏、张秀川来海军.....		53
二 青岛比武和两次海战.....		57
三 “三·二”会议上的争论.....		64
四 山雨欲来风满楼.....		69
五 一次失败的夺权尝试.....		75
六 终于汇入一场内乱之中.....		87
七 “九·一三”事件前夕.....		95
八 由解放干部引出的问题.....		101

九	又触暗礁.....	107
十	立不住的“罪证”.....	118
十一	欲干不能.....	125
十二	欲罢不忍.....	132
十三	行路难.....	138
十四	风波再起.....	144
十五	一九七六年的大较量.....	150
十六	悲喜交集.....	160

武汉“七二〇事件”亲历记.....	陈再道	169
一	狂潮欲来.....	169
二	北戴河之行.....	175
三	卷入漩涡.....	184
四	风沙漫天进北京.....	191
五	是谁唯恐天下不乱.....	198
六	“保陈再道去”.....	203
七	越唱越凶的对台戏.....	211
八	制造出的“七二〇事件”.....	218
九	机舱中回顾与反思.....	233
十	“胜利者”的发泄.....	244
十一	缺口打开之后.....	252
十二	“失败者”的遭遇.....	258
十三	株连之祸.....	268
十四	被逐离京.....	278
十五	汗洒锦江畔.....	285
十六	历史的回答.....	300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

徐向前

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，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岁月。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，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，谁也没有料到，竟会冒出一场“文化大革命”来，持续那么久的时间，造成那么严重的危害。对此，党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已经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。我在这里，只想就自己经历的几件大事，略作叙述。

一 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

“文化大革命”伊始，急风暴雨，铺天盖地，火药味浓极。《五·一六通知》，批判“彭、罗、陆、杨”，红卫兵破“四旧”，学生“造反”，横扫一切“牛鬼蛇神”，揪斗“走资派”、“黑帮”，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毛主席“炮打司令部”，林彪当“接班人”，全国学生大串连，批判刘邓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……。仅半年时间，闹得天下大乱，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、秩序与生活。

我和许多同志一样，对这场突如其来的“文化大革

命”，缺乏准备，很不理解。但有一条，军队和地方不同，不能乱。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可是，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，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《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》，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，强调“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，和地方院校一样，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，要充分发扬民主，要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，在这方面，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。”文件下达后，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，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，不断发生。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，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，涉及国家安全，担忧得很。

十一月间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：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，请总理、陶铸和几位老师接见、讲话。我说：你们起草个稿子，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！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，军队要稳定，不能乱。他说：还是请老师们都讲一讲，这样更好些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会前，肖华同志来我家一趟，送来了讲话稿，我看后略作修改，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。十一月十三日，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，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，会场里不下十万人，又唱歌又呼口号的。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，陈毅、叶剑英、贺龙和我讲了话。那时，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，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，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，做出好样子。陈毅同志说：今天来体育场，就是要泼冷水。“泼冷水是不好的，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，太热了，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”。他还说：我不赞成“逐

步升级”的办法，口号提得越高越好，越“左”越好；搞倒几个校长、处长、副处长不过瘾，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，还要升级。他提醒大家，不要犯简单化、扩大化的错误。我在讲话中指出：“我们的陆、海、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，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，做到一声令下，立即行动。”“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，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不容丝毫的松懈。”贺龙同志也讲了话。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，处境岌岌可危，能出席大会，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。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：

“真理是真理，跨过真理一步，就是错误，就变成了谬误。”“学毛著，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，不是迷信。不要光注意背书，不会行动，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。”叶帅讲话时，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，递了张条子，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？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。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，当场念给大家听，说：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，大家相信吗？这次开会，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，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，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，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？我们的讲话，语重心长，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，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，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“罪状”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军委文革又安排第二次接见。陈毅、叶剑英和我，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。踏上主席台，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，写着要批判陈、叶十三日的讲话，还有什么“炮轰”、“火烧”之类的。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，头痛、疲劳，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。陈毅同志讲话较长，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

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，规劝大家正确对待“路线斗争”。我因头疼加剧，提前退场，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。

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，招来了麻烦。觊觎军权的江青一伙，趁势叫嚣军内有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要“改组军委文革”。组长刘志坚被撤职、揪斗，陈毅、叶剑英遭到“炮轰”。军队越来越乱，许多人晕头转向，无所适从，不知道听谁的好。

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，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，说有要事找我谈，但他来我家不方便，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。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：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。我有点吃惊，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我多年有病，身体不好，对干部情况不了解，请转告毛主席，这个工作我干不了！”他说：“不行啊，这是江青提议，毛主席批准的。”听到是江青提议，我愈加莫名其妙。就说：“我的确干不了，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！”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，说他马上要去开会，便夹起皮包，匆忙告辞了。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。江青其人，我们对她不了解，平时毫无来往，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，见面打打招呼而已。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，毛主席找我谈工作，她极少在场。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，不知出于什么用心。想来想去，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，恐怕推是推不掉的，只好硬着头皮干。后来，我见到毛主席，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，请主席另选贤能。毛主席说：天塌不下来，你就干吧！

一月十日，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

文革的通知，征求我的意见。并说：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，也想看看，已送他们征求意见。我阅后提了三条：

（一）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，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，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，交代一下政策。（二）要讲革命性、科学性、纪律性。军队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要党的领导不行。尤其是海、空军，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，要随时准备战斗，指挥失灵了不好。现在有些机关干部，要求成立“战斗组织”，机关如果形成几派，就不好办了。（三）部队中哪些人是“牛鬼蛇神”，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。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，又要抓杨勇、郑维山；空军也把王辉球、成钧、常乾坤抓走。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，否则大家没有底。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，就是部队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要有党的领导，要保持军队的稳定，不能象地方上那样，无法无天，乱揪、乱斗、乱冲。十一日，又送来正式通知：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“军委通过，中央批准”。十二日，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，成员共十八人。组长徐向前，顾问江青，副组长肖华、杨成武、王新亭、徐立清、关锋、谢镗忠、李曼村。组员：王宏坤、余立金、刘华清、唐平铸、胡痴、叶群、王峰、张涛、和谷岩。下设秘书组、简报组、机关组、院校组和联络站，办公地点在三座门。

我刚刚上任，正赶上“一月风暴”，局面混乱不堪，简直没法收拾。以上海“造反派”领头掀起的“夺权”浪潮，波及全国各地区、各行业、各部门，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个大革命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。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，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，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。”

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“烧”，说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。”军队院校的“造反”组织，纷纷夺权，两派群众开始武斗；解放军报社“小将”掌权，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；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、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，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；全军文革被“造反派”包围，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，不知下落；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，少则几人、几十人，多则数百人、上千人，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。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，我家原有两部电话，又增加两部，还是不够用的。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。我除了开会，还要接见“造反派”。不论白天、晚上，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。我那时常感疲劳，火气也大，说话难免“出格”。周总理对我说：“你和他们打交道，要掌握八个字，就是多听少说，多问少答。”后来接见群众组织，我就采取这种对策。

一月中旬，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问题，发生了“大闹”京西宾馆事件。

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，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名。他说：“肖华不象个战士，倒象个绅士。”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，有人贴出大字报，要揪斗、打倒肖华同志。周总理很生气，出来辟谣，说这是谣言。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，江青很紧张，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。我们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，便未再追究。

一月十九日下午，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。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“四大”的问题，叶剑英、聂荣臻和我，与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姚文元争论起来。他们认为军队不

能搞特殊，应和地方上一样，开展“四大”。我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，战备任务很重，和地方不同，不能搞“四大”。争来争去，僵持不下。这时，叶群说她要发言，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，念了起来。内容是什么呢？批判肖华。她说：肖华反对林副主席，破坏文化大革命，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。陈伯达、江青在一边帮腔，说了肖华同志许多坏话。江青说，肖华是总政主任，发文件，把总政和军委并列，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，也都有讲话稿。显而易见，这次“批肖”，是江青、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，对我们搞突然袭击。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，我们又不知道江青、叶群代表谁的旨意，事关重大，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：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，不准外传，这是一条纪律。但散会后，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，风漏出去了。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，被群众组织偷看，知道了会议内容。于是，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，便抄了肖华的家，抢走不少文件。肖华同志从后门走脱，跑来找我，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，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，坐车去西山住下，才免遭揪斗。我得知此事后，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。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，我打电话找他，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。

次日上午，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。杨勇同志来到后，我又当面说了他。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？他躲到哪里去了？”在那里火上加油。这时，肖华来了，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。我气得拍了桌子，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。叶帅气愤地说：肖华是我保护起

来的，如果有罪，我来承担！他也拍了桌子，把手骨都拍伤了。所谓“大闹”京西宾馆的事件，就是这样。事后，成了“二月逆流”的一条主要“反党罪行”。

接下来又发生揪斗杨勇同志的事件。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“二月兵变”问题被揪出后，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，担子很重，也很尽职，有事及时向我们请示报告。杨勇是个好同志，是员战将。对党忠诚，待人诚恳，善于团结干部，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，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，均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一月间，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：杨勇恐怕保不住了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：上峰的意思，对杨勇要“烧而焦”。我猜想，这位“上峰”大概是林彪。因为我听林彪说过，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，每次通知他汇报，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。还说：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。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，一直耿耿于怀。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，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。我们批评杨勇，要他检讨，目的是为了帮他“过关”。可是，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。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，北京军区的“造反派”就掀起了揪斗、打倒杨勇的浪潮。一月二十三日，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，高呼“打倒杨勇”的口号，要我接见、表态，不接见就不走。我接见他们，说：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，但要掌握政策，“烧而不焦”，不能打倒他。但那时说这些话，根本没有人听，已经不起作用了。

全军文革成立时，林彪曾规定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，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，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，然后报告他。我上任之初，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

部的不正常状况，请出顾问江青来，陪我去讲话，保干部，不准乱揪乱斗。去了两三次，江青就不干了，她说：“这样下去，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！”以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。你要找她，工作人员不是说她不在，就是说她刚吃完安眠药入睡。全军文革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，不论书面的或电话的，犹如泥牛入海，有去无回。林彪更鬼，躲在家里观察动静，极少出面答复问题。叶剑英是军委秘书长，我是全军文革组长，被推在第一线，“作蜡”的是我们，还有徐立清、李曼村等同志。当时，军队乱得一塌糊涂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，住在京西宾馆“避难”。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，有的被一派揪走，有的被一派藏起，不知下落。各地的“造反派”无法无天，到处哄抢档案、查抄文件、冲击军事机关、抢劫武器弹药……军队指挥失灵，无法担负战备任务，我们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当然着急。为了应付这种混乱状况，我和叶剑英、聂荣臻同志多次开会研究，有几次还请陈毅和刘伯承同志参加，大家除了担心、气愤之外，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良策。那时，离开中央文革和林彪，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；即便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，又有谁听你的！

连续发生批判肖华、揪斗杨勇的事件后，我们心急如焚，几次打电话找林彪，他都不见。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干脆去“闯宫”。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，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。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，不便阻挡，领我去会客室，林彪、陈伯达正在交谈。我开门见山，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，说：军队要稳定，这样乱下去不行，要搞几条规定，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、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、不准

夺权等。林彪连连点头，说：是的，军队不能乱，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。当即由他口述，秘书记录，整理了七条。接着，他说请叶、聂来研究一下。陈伯达便起身告辞。叶、聂来后，都赞成七条。确定由叶、聂和我去钓鱼台，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。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，请他到钓鱼台开会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。

我们到钓鱼台，中央文革的人都在，陈伯达也在。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。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，让人念了文件内容，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。江青坐在一个角落里说：

“向前同志老了，不能工作了！”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。我想，看来我刚上台，就要下台啦！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，对我说：已经通过，你快点走吧！我便起身告辞，将文件送到林办，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。“七条”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，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，征求意见。大家讨论中，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予抄民主人士的家，影响不好，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。我们采纳，“七条”遂变成了“八条”。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，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“八条”送毛主席审批。毛主席完全同意，当场批示：

“所定八条，很好，照发。”林彪拿到批示后，对毛主席说：“主席，你批了这个文件，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！”据我观察，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。他是国防部长，主持军委工作，军权在握，军队大乱特乱，向毛主席交不了帐，对他不利嘛！

回来我们即以“军委八条命令”正式下达文件。具体内容是：

一、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，争取和团结大多数，坚决反对右派，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，坚决采取专政措施。

二、一切指战员、政治工作人员、勤务、医疗、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，必须坚守岗位，不得擅自离岗。要抓革命，促战备，促工作，促生产。

三、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，应该实行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，充分运用摆事实、讲道理的方法。严格区别两类矛盾。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，不允许任意抄家、封门，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，例如戴高帽，挂黑牌，游街，罚跪，等等。认真提倡文斗，坚决反对武斗。

四、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、文艺团体、体工队、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，应迅速返回本地区、本单位进行斗批改，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，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。

五、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，要分别对待。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，要追究，如果是左派冲击了，可以不予追究。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。

六、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，不准冲击，不准串连。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、档案和技术资料，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。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，听候处理。

七、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

命。军、师、团、营、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，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，以利于加强战备，保卫国防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

八、各级干部、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，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，认真与工农相结合，拜工农为师，参加劳动锻炼，改造世界观，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。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，应该交给群众教育，严重的，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。

有了“八条命令”作武器，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，硬了许多。有些军区，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，保护起来。对于冲击军事机关、搞打砸抢的“造反派”，抓了一批。三支两军的同志，在坚持文斗、反对武斗和稳定地方局势方面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这时，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，气急败坏，诬蔑军队“镇压群众”，“支持保皇派”，是“带枪的刘邓陶路线”，要“揪出军内一小撮”，妄图煽动群众，与军队对立，搞垮全军文革，搞掉“八条”，搞乱军队，以便乱中夺权。

二月八日开始，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，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，研究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问题。出席会议的有：周恩来、李富春、陈毅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谭震林、李先念、余秋里、谷牧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、关锋等。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，时间在下午。会上，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一方，中央文革陈伯达、康生等人为一方，展开了激烈斗争。